



周恩来对外宣传的工作方法

□ 杨彩霞

周恩来是我们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我们党杰出的宣传家，他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有关对外宣传的理论和工作方法，为塑造党和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增进国际社会理解、顺利开展外交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真实不浮夸

真实是对外宣传的生命。周恩来在外宣实践中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些人同外宾谈话时常常只讲成绩不讲困难。周恩来认为，对外国人要讲真话，要谦虚，不要夸大已取得的成绩，更不要讲空话大话，成绩要讲，缺点错误和困难也要讲，这样的宣传才能提高我们在国内外的地位。“中国还很穷，很落后，这一点不讲外国人也知道，可能知道的还要多，所以‘不言’就太消极了”。1956年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埃及新闻代表团，真实而全面地向初次到访的客人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毫不掩饰。当他得知埃及的总编记者们要到中国各地访问参观时，特别叮嘱他们：访问参观时要多观察多提问，不要只听陪同人员的讲解，他们给你讲的可能都是好的一面，自己多观察才能了解全貌。正是周恩来所展现的大国自信和诚挚负责的态度，使埃及客人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充满信心和敬意。可见，求真的外宣行为确实可以赢得国际尊重。

真实是争取主动的前提。有次外宾参观新安江水库，讲解员讲解说这个水库是世界上最好的。周恩来知道后说：“我们对外宣传既不要浮夸，也不要说得很玄，把我们什么东西都说成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要实事求是。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世界先进水平，可是我们解说员就这样讲，人家一问就回答不出来了……”他又说：“对于不实事求是的对外宣传，我们外事工作人员应该当场给予纠正，并敢于当面承认错误，应该有这个勇气。”在周恩来看来，凡事都不能绝对化，不能说好都好，说坏都坏，不能铁板一块，要一分为二，这才是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们外宣工作成绩显著，即使有人不同意周恩来的观点，也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事实，这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威信和力量，也使我们能在具体的对外宣传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求同不立异

做好外宣工作的方法之一就是求同存异，求国与国之间共识，解国与国之间异议。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这是亚非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自己召开的、任何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都无权参加的国际会议。当时，与会的一些国家代表仍随着美国的指挥棒转，组成反共同盟将矛头指向了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会议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进行，前景似乎不妙。甚至一些美国记者的新闻草稿已经拟就：与会国家争吵不休，周恩来激烈反击，亚非会议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轮到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发言时，他首先将主要发言稿印发给了与会人员，未照本宣科，而是开门见山亮明态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第一句话一出口，会场气氛陡变，紧接着，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宣传个人意识形态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事实胜于雄辩，真诚足以动人，随后他讲述了许多亚非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亲善合作的具体事例，探讨了各国共同利益所在，唤起与会国的共鸣、同情与支持。这时，会场气氛明显缓和，周恩来不回避任何一个争论焦点，心平气和地据理力争，巧妙地将那只企图搅乱会议秩序的黑手推开。接着，周恩来针对会上有人提出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所谓的颠覆活动问题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回答国外记者的尖锐提问甚至挑衅时，周恩来坦率从容，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他说：“我们是容许不明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周恩来用真诚自信的态度回应外界怀疑甚至是诽谤，粉碎了有些国家孤立中国的企图，为新中国赢得了尊重和友谊。

精准不随流

新中国的诞生，对世界格局和世界人民产生深远影响，如何及时发出中国声音、准确表达中国理念、快速提高国际地位成为重大课题，这都要求我们迅速占领国际舆论阵地、发出精准声音。

周恩来深谙此中道理，为了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他邀请富有国际声望和国际宣传经验的宋庆龄来创办一个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周恩来对《中国建设》的创办高度重视，从办刊方针、编委构成、作者选择到刊物定位、行政归属，都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他非常赞同以民主人士、宗教领袖和大学教授为主要编委，以专家学者为主要作者，以资本主义国家进步人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刊物定位，并把刊物行政归属为救济总署而未纳入中央宣传机构体系。“大跃进”时，有人建议《中国建设》刊登更多有关政治的内容，周恩来却指示“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如果刊登过多的政治内容，刊物就失去了原有的风格，反而宣传效果不好。随后陆续有人建议重新改组刊物编委会的人员身份构成等，周恩来都竭力保持刊物原有的办刊方针和刊物广泛的统一战线色彩。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中国建设》不负众望，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保持真实报道的传统，及时准确客观地展现中国的文化和变化，成为外国友人了解中国的窗口，并将这一风格延续至今。

发精准声，要内外兼顾，正确认识和认真研究西方话语，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周恩来要求刊物对外宣传时要深入接触国外受众，尊重不同国家人民的文化和习俗，量体裁衣，精准推送，用目标国家人民易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问题。在具体技巧上，周恩来多次提及对外宣传不要只宣传大的概念，话语表达要具体化，因为能激发人的往往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周恩来的这些宣传理念历久弥新，对今天的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仍大有裨益。

党史人物

杨明斋，革命烈士，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1882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闯俄谋生，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运动，被推选为华侨工人代表，并光荣地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他被李大钊誉为“万里投荒，一身是胆”，周恩来赞誉他是我们党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杨明斋为人耿直、胸怀坦荡，一生勤勉工作、不务虚名、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尊敬。

“青年团是党派杨明斋负责的”

1920年4月，杨明斋随同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工作小组来到中国，该小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杨明斋是工作组的重要成员兼翻译。5月前后，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帮助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8月下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早期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杨明斋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杨明斋的建党活动不仅仅局限于上海，他还到自己的家乡山东，与济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王尽美等人会面，筹备创建山东早期党组织。

上海的早期党组织建立后，为培养更多的青年投身革命活动，培养党的后备力量，决定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年轻且具有经验的杨明斋具体负责。他“引导俞秀松等认真讨论和规定了团的宗旨、性质、组织机构，明确了团的任务和作用”。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杨明斋的住所宣告成立，杨明斋等8人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并推选最年轻的团员俞秀松任书记。之后，北京等地相继建立团组织，团中央机关仍设在杨明斋的住所上海渔阳里6号。据陈望道回忆，“主持青年团的是从俄国回来的杨明斋和一青年俞秀松，另外还有几个青年”。

“替党作翻译、教育工作”

1920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是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杨明斋担任校长和俄语教员。教师多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在任课教

师中，任课时数最多、最经常的是杨明斋”。学员最多时达到五六十人，在这些学员当中有刘少奇、任弼时、李启汉、曹靖华等。为加强对革命青年的教育和培养，党的早期组织还成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由杨明斋任副主任。杨明斋的住所成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个工作部，杨明斋就是这个工作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萧劲光说，“在外国语学社负责的是杨明斋。那是一个挺和蔼可亲的山东人，俄语说得很好”。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过程中，由杨明斋任社长的中俄通讯社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机构，秘密地开展党的革命工作。该社是共产国际工作组建立的一个公开活动机构。通讯社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和报道有关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资料，并把中国报刊上的重要信息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为扩大信息宣传，还在北京设立了分社。“杨明斋领导的中俄通讯社，旗帜鲜明地、真实地报道苏俄各方面的情况，深得中国人民信赖”。

“开展工运、组织群众”

1920年10月3日，在杨明斋住所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杨明斋以嘉宾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工人讲述受剥削的真正原因。在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上海机器工会于11月21日在白克路上海公学正式成立，前来参加成立大会的嘉宾不下千人，杨明斋等到会祝贺。陈独秀、杨明斋等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在指导成立各行业工会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建立跨行业的工人大联合。1920年12月20日，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公学召开各行业工人的联合组织——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杨明斋等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演讲，他们在演讲中号召工人破除迷信、振作精神、团结起来，改变“金钱万能，劳工无能”的旧观念。实际上，“工人游艺会”和党后来领导建立的工人俱乐部一样，成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活动场所，为各行业工人的团结进步创造了条件。

“作为代表出席国际会议”

1921年6月22日，杨明斋和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的委派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绝大多数

有贡献的「忠厚长者」——杨明斋：对建党

□ 陈安杰

欧美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外，还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各国的代表。张太雷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了言，他们还同其他东方代表一起，在会议上努力促成共产国际作出召开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据鲍里斯·苏米亚茨基证实，他在伊尔库茨克负责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时，“与中共党人张太雷、杨明斋有接触”。杨明斋是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

1938年2月，杨明斋在苏联以被捏造的罪名逮捕，是年5月牺牲。1989年1月，苏共中央为杨明斋恢复了名誉，8月，杨明斋由我国民政部门公布为革命烈士。我们党的这位“忠厚长者”怀着崇高的信念，孜孜不倦地工作，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不可忘却的，应当永载史册。

史海拾贝

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红色歌谣作为革命文化的载体和组成部分，真实地记录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反映了革命文化的形成过程，蕴含着革命文化的精髓，是解读革命文化的重要文本和视角。

记录了革命文化的重要信息

革命文化的载体可分为物质形态和信息形态两大类。物质形态载体包括革命旧址旧址、革命文物、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等场所化的革命历史遗存。信息形态载体包括历史图片、信函、文件、文献、经典著作、口述史料、手迹、标语、歌谣、戏剧等文字、音像、图片方面的历史遗存，集中反映了革命文化中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内涵。

歌谣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话语形式”，是传播、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信息载体，具有情感宣泄、愿望表达、社会教化、凝结力量的功能。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的红色歌谣具有存史功能，是人们对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救亡图存那段历史的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些歌谣政治色彩浓厚、内容积极向上、语言朴素简洁、地方特色鲜明，与其他革命文化形式一道，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宣传革命、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瓦解

敌军、凝聚军民力量的重要作用。

红色歌谣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而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高贵精神品格，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是革命文化的重要信息载体。

反映了革命文化的形成过程

革命文化萌芽于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一期间，歌谣的收集、整理、创作、传唱，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传播思想的重要途径，出现了许多揭露社会腐败黑暗、描述社会底层牛马不如、要求摆脱封建束缚的歌谣，如《坚持到底》《孟姜女》《五一纪念歌》等，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关注和尊重，是红色歌谣的重要源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也开始建设自己的革命文化，利用歌谣对广大群众进

行阶级教育和战争动员。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处，就组织专门人员教群众唱革命歌曲、解释其中蕴意，传播革命火种。中央苏区时期，还专门成立了一些文艺机构，负责教唱红色歌谣，以加快红色歌谣的传播速度，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红色歌谣，如《共产三字经》《苏区干部好作风》《十送红军》等。除中央苏区外，其它革命根据地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红色歌谣。这些歌谣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途径，全面反映了各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学习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革命文化进入了繁荣期。歌谣与同时期的电影、戏剧、话剧等文化作品，不仅发出了“铁蹄下的呐喊”，控拆了中华民族的苦难遭遇及社会底层的悲惨生活，而且讴歌了中华民族不甘压迫、勇于抗争、敢于追求光明的优秀品质，如《国耻纪念歌》《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等。这些歌谣曲调激昂奋进，内容历久弥新，至今仍在传唱，是当时凝聚民族力量的号角和精神纽带。

抗战胜利后，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而党的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独裁的面目，为争取人民民主、凝结社会力量、夺取全国解放提供精神动力。期间诞生的许多红色歌谣都体现了这一主题。“九月里来刮秋风，红旗飘扬在天空，各路大军都出动，人喊马嘶多威风。问一声同志们到哪儿去呀？咳，杀进蒋管区。”这首《全国大反攻》的歌曲采用了东北秧歌节奏，以比兴的手法，形式活泼，描绘了全民团结一心、奋勇杀敌的情形，散发出浓郁的北方气息。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化是当时的主流文化。这一时期不仅传唱红色歌谣是一种文化时髦，而且结合时代的实践，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歌曲，如《咱们工人有力量》《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社会主义好》《泉水叮咚响》等。这些歌曲讴歌了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赞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建设成就，反映了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团结一心、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

体现了革命文化的内在特质

红色歌谣与革命文化共同反映了党的意志，发挥了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巩固红色政权服务的作用，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性、政治性、大众性和创新性。

党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围绕这些目标和中心任务，党也有不同的政策策略和具体实践，孕育了不同时段不同主题的革命文化。而不同时段不同主题的革命文化，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红色歌谣与其相对应。如《红军上了井冈山》反映了建立革命根据的重要性，以及对革命必胜的信心。《长征组歌》及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反映了长征中无数的艰难险阻及红军官兵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满怀喜悦的战斗豪情。

革命文化是在推翻旧制度、打破旧秩序中生产的，是在对抗买办文化和封建文化中产生的，旗帜鲜明地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公开宣称作为革命

战争服务、为巩固红色政权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体现了党的意志和主张。红色歌谣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党扩大政治影响、实现政治主张的重要途径，是刺向敌人的一把匕首。通过红色歌谣的传唱，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最大限度地凝聚了革命的力量。

革命文化不仅是革命实践的需要和产物，而且还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它来源于实践和人民，服务于实践和人民，承担着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文化素质的责任，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以红色歌谣为例，不仅其内容总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直接相关，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思想、愿望、情感，而且许多歌谣是广大群众根据自己在斗争生活中的体验自行创作的，形式为百姓喜闻乐见，风格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歌谣的创作、加工、流传和风格特点体现出明显的大众性。

在理论渊源上，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汲取了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开放性、包容性特点。在实践渊源上，革命文化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的中国化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产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体现出较强的创新性。

党建视角